

# 我国黄瓜、丝瓜起源考

程 杰<sup>\*</sup>

〔摘 要〕 黄瓜的传入应与东汉以来佛教的传入有关,十六国时期的译经中已有“胡瓜”之名,隋炀帝时改名黄瓜。受佛经对其性味负面说法的影响,长期未获重视。南宋以来,种植、食用逐渐普遍起来,且由早期食用老瓜转为以食用嫩瓜为主。我国宋以前无任何丝瓜迹象,北宋后期以来始见记载。其别名“鱼际”或为外来音译,传入我国当在北宋中期或稍前。宋人有关记载多出福建、浙江,此后地方志的记载也以此两省最多,两广方志多称从福建引入。由此可见,丝瓜当是入宋后,随着闽、浙一带对外交通贸易的兴起而由海上传入。

〔关键词〕 黄瓜;丝瓜;物种;起源;外来

黄瓜、丝瓜都是分布较广的蔬菜作物,一般认为原产于亚洲南部,尤其是印度为中心的喜马拉雅山南麓广阔地带。虽然近百年来,我国云南也曾有过野生丝瓜的报道,但就古籍相关记载看,我国黄瓜、丝瓜的种植较之甜瓜、冬瓜等本土传统瓜类作物要晚得多,显属外来物种。而具体的引入时间和相关情况,农史学者虽多涉及,但由于直接资料极其有限,一时都言之难明。笔者接着前贤时彦的工作,广泛搜集资料,细加梳理考察,力求对我国黄瓜、丝瓜的物种起源问题有一些更切实、具体的认识。

## 一、我国黄瓜的起源及食用演变

黄瓜本名胡瓜,为外来作物。今有关科学研究表明,印度种植黄瓜历史悠久,最有可能是其原产地<sup>①</sup>。《本草纲目》称“张骞使西域得种,故名胡瓜”<sup>②</sup>,此说未明出处,当凭空而来,想其当然,不足为据。但黄瓜来华的时间,不在两汉,也不会晚于魏晋。《道藏》本陶弘景《养性延命录》讲饮食避忌时称“真人言”：“胡瓜合羊肉食之发热。”<sup>③</sup>该书或疑出初唐孙思邈,今人多归南朝梁陶弘景(456—536),并认其内容多辑自魏晋张湛《养生集》、道林《摄生论》、翟平《养生术》、黄山《黄山子》《黄山君

\*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10097。

①参见[英]德空多尔:《农艺植物考源》,俞德浚、蔡希陶编译,胡先骕校订,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年,第141—142页;[日]星川清亲:《栽培植物的起源与传播》,段传德、丁法元译,郑州:河南科技出版社,1981年,第62页;安志信、孟庆良、刘文明:《黄瓜的起源和传播初析》,《长江蔬菜》2006年第1期;林德佩:《黄瓜植物的起源和分类研究进展》,《中国瓜菜》2017年第7期。

②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二八,李贵迁等点校,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94年。

③陶弘景:《养性延命录》卷上,明正统《道藏》本。

诀》等书<sup>①</sup>。这段标明“真人”的饮食养生之言,应属陶弘景本人,也就是说在中土文献中,至迟在梁陶弘景时代已经出现“胡瓜”之名,且已有一定的食用经验。

黄瓜传入的途径很可能与佛教来华有关。佛陀耶舍、竺佛念译《四分律》卷四十三:“诸比丘在不净地种胡瓜、甘蔗、菜,枝叶覆净地,比丘不知为净不,佛言不净。时有在净地种胡瓜、甘蔗、菜,枝叶覆不净地,不知为净不,佛言净。”昙无讖译《大般涅槃经》卷二十七:“譬如胡瓜名为热病,何以故?能为热病作因缘,故十二因缘亦复如是。”前者是说佛徒修身,如种胡瓜、甘蔗和蔬菜,立身净则净。后者以胡瓜食用必发热病可以为名,比喻十二因缘总具佛性。两部经书均译于十六国时期中叶,两位主译者均为后秦(384—417)、北凉(397—439)时受邀来华译经传教的印度和罽宾(今克什米尔一带)人。可见胡瓜之名源自译经,胡瓜即黄瓜是佛经中一个重要的譬喻或意象,在佛教本土即印度和克什米尔一带民众生活中比较常见,最迟在十六国中叶,随着佛教的传入而带来中土,最初应主要见于北方。所谓“胡”本应泛指天竺(印度)和西域。至陶弘景生活的南朝梁代,佛教在南方也得到了发展,《养性延命录》称胡瓜不可合羊肉同食,显然也是受佛经胡瓜性热说的影响。

陶弘景稍后,成书于六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开始著录胡瓜种植和收藏之法,已十分详细:“种越瓜胡瓜法:四月中种之(胡瓜宜竖柴木,令引蔓缘之)。收越瓜欲饱霜(霜不饱则烂),收胡瓜候色黄则摘(若待色赤,则皮存而肉消也),并如凡瓜,于香酱中藏之亦佳。”可见此时至少在北方地区种植已较普遍,食用经验也较为丰富。

关于胡瓜改名黄瓜的时间,《本草纲目》胡瓜“释名”称:“藏器曰北人避石勒讳改呼黄瓜,至今因之。……杜宝《拾遗录》云,隋大业四年避讳改胡瓜为黄瓜,与陈氏之说微异。”认为有两种说法,一是唐人陈藏器《本草拾遗》所说。实际唐人并无此说,而是李时珍错会大观《证类本草》“胡瓜叶”下“胡瓜”内容。《证类本草》所辑实出《嘉祐本草》,文末小字注称“见《千金方》及孟诜、陈藏器、日华子”,是综述诸家所说,并非只录陈藏器《本草拾遗》一种。今人辑复孟诜《食疗本草》和陈藏器《本草拾遗》,都将这段“胡瓜”内容悉数辑入<sup>②</sup>。实际这段文字应为宋《嘉祐本草》原文,尚志钧《嘉祐本草》辑复本即将这段文字连同小字注文全部辑入<sup>③</sup>。最后一句“北人亦呼为黄瓜,为石勒讳,因而不改”,李时珍归为陈藏器所言。而敦煌抄本陈藏器《本草拾遗》残卷(S76号)瓜果蔬菜类药物内容多在,此句恰不见于“胡瓜”条下<sup>④</sup>,是不出陈藏器无疑。实际这句应是《嘉祐本草》所述四人中排名最后的宋初日华子所说,更有可能是《嘉祐本草》编者缀录前人之言后的按语,总之反映的是北宋人对这一问题的态度,意思是“北人”虽有“黄瓜”之称,而此处著者仍用“胡瓜”旧名。当时宋、辽分治,宋人称辽境之民为“北人”。

而另一说出唐人杜宝《大业拾遗录》:“(大业)四年,(隋炀帝)改胡床为交床,改胡瓜为白露黄瓜。”<sup>⑤</sup>此说也得到唐人吴兢《贞观政要》的证明:“贞观四年,(唐)太宗曰:‘隋炀帝性好猜防,专信邪道,大忌胡人,乃至谓胡床为交床,胡瓜为黄瓜,筑长城以避胡,终被宇文化及使令狐行达杀之。’”<sup>⑥</sup>笔者认为,太宗皇帝李世民有言在先,唐人应不会轻易篡改,唐末段公路《北户录》崔龟图注、宋初《太平御览》所辑都只引杜宝所说<sup>⑦</sup>,未见有人提及石勒,可见所谓石勒改名说应是宋人因史家有“石勒讳

①朱越利:《〈养性延命录〉考》,《道教考信录》,济南:齐鲁书社,2014年,第23—47页。

②参见尚志钧辑校:《食疗本草(考异本)》,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第80—81页;尚志钧辑释:《本草拾遗辑释》,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第290—291页。

③尚志钧:《嘉祐本草辑复本》,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457页。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长编》卷五,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298页。

④黄永武主编:《敦煌宝藏》1册,台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1年,第411页;胡同庆、王义芝:《智慧敦煌:揭秘敦煌壁画中古人生活智慧》,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15年,第160页。

⑤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九七七,《四部丛刊三编》影宋本。

⑥吴兢:《贞观政要》卷六,《四部丛刊续编》影明成化刻本。

⑦段公路著、崔龟图注:《北户录》卷三,清《十万卷楼丛书》本;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九七七,《四部丛刊三编》影宋本。

胡，胡物改名”<sup>①</sup>之事而想其当然，不足为据，胡瓜改名黄瓜应出于隋炀帝无疑。

尽管宋人本草书中仍间见采用“胡瓜”之名，但更多情况下则称黄瓜。至少从南宋中期开始，如《梦粱录》《（宝庆）会稽志》《（宝祐）重修琴川志》《（咸淳）临安志》等都称黄瓜。元人更是如此，北宋人著录多称“胡瓜又名黄瓜”，而元以来则反过来，多转称“黄瓜，一名胡瓜”<sup>②</sup>。这既有南宋以来语言习俗渐变的因素，也与元蒙统治下“胡瓜”之名颇多忌讳有关，从此黄瓜便成了流行的通称。

关于元以后我国黄瓜栽培的发展历史，舒迎澜《黄瓜和西瓜引种栽培史》有较为全面、详细的论述，此不再赘述，但有两点关乎早期发展，需要补充：

一是黄瓜食用价值认识的变化。黄瓜传入中土之初发展较为迟缓，主要见于北方地区。《齐民要术》所说“种胡瓜法”，应是民间种植食用情况，而《大唐开元礼》“荐新于太庙”中胡瓜与冬瓜、瓠子齐名并列<sup>③</sup>，则是用作祭祀，反映的都主要是北方地区的情景，同期南方却缺乏类似的记载。而且在整个中古，除佛经、本草、农圃类著作间有提及，其他文化和生活信息很少有黄瓜的影子，人们言之极少。偶尔见到“黄瓜”一词常指黄熟之瓜，如古乐府《前溪歌》“黄瓜是小草，春风何足叹”，苏东坡著名的词句“半依古柳卖黄瓜”（《浣溪沙》），说的是黄色甜瓜。究其原因，应是由于前引佛经所说食用胡瓜易患“热病”。传入之初，佛经关于黄瓜的负面说法显然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唐人孙思邈《千金要方》称胡瓜“有毒，不可多食，动寒热多疟病，积瘀血热”<sup>④</sup>，此后本草、医疗养生类著作多有这方面的负面描述和诸多禁忌。宋人苏颂《本草图经》虽未正面发表意见，但也称“胡瓜黄色，亦谓之黄瓜，别无功用，食之亦不益人，故可略之”<sup>⑤</sup>，一副鄙薄不屑之言。南宋早期《分门琐碎录》“种菜法”中有“种丝瓜”的内容，却未提到黄瓜。可见整个北宋以前，至少在南方地区，黄瓜并未引起人们重视，种植、食用远未流行，南宋以来情况才明显改变。南宋《（淳熙）新安志》《（嘉泰）吴兴志》《（宝庆）会稽续志》《（宝祐）重修琴川志》、元《（大德）昌国州图志》《（至顺）镇江志》等方志物产志开始著录黄瓜。元王祜《农书》也正式著录黄瓜，入明后各类农圃、本草和生活类著述多详言黄瓜的种植和食用之事。明嘉靖间镇江宁原《食鉴本草》说黄瓜“清热解渴利水道”<sup>⑥</sup>，后世谈及黄瓜功效都取此说，颠覆了宋以前黄瓜动寒热、易致病的传统说法。这既是对南宋以来人们食用经验的总结，也进一步解放了人们对黄瓜食用价值的认识，大大促进了明清时期黄瓜种植的发展。

二是黄瓜嫩、老不同食用对象的变化。黄瓜食用最初多待成熟、皮色变黄后以腌、糟、酱等腌渍之法贮存备食。《齐民要术》载其种法、藏法即与越瓜合并而言（引见前），可见此时黄瓜还未用于嫩食，而是候其黄熟采摘，与越瓜（菜瓜）、冬瓜一样制作贮存，黄瓜之得名应即由此而来，这与我们今天多于青嫩时采摘鲜食、腌制两用很是不同。盛唐祭祀以黄瓜“荐新”，时间不明，无法判断所用黄瓜是嫩是老。南宋陆游《新蔬》“黄瓜翠苣最相宜，上市登盘四月时”，黄瓜与莴苣同时，所说黄瓜显然非属老熟，应是青脆的嫩瓜，这是黄瓜嫩食最早的信息。元人王祜《农书》讲黄瓜、越瓜“生熟皆可食，烹饪随宜，实夏秋之嘉蔬”<sup>⑦</sup>。明《（成化）兴化府志》（兴化府境约当今福建莆田市）：“刺瓜，近者首有刺，故名。其味最清，剖之一座皆有清香之气。初青熟黄，故又呼黄瓜，夏秋二季皆有之。”<sup>⑧</sup>都是兼夏秋两季、老嫩两种而言。而明正德十二年《金山卫志》（今属上海）：“黄瓜，端阳食新嫩者，青、白色，有刺。”<sup>⑨</sup>所

①欧阳询：《艺文类聚》卷八五，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司农司编：《农桑辑要》卷五，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③萧嵩：《大唐开元礼》卷五一，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孙思邈：《千金要方》卷七九，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唐慎微：《证类本草》卷二七，《四部丛刊》影金泰和晦明轩本。

⑥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二八。

⑦王祜：《王祜农书》卷二九，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⑧陈效修、黄仲昭纂：《（弘治）大明兴化府志》卷一三，清同治十年重刻本。

⑨张奎、夏有文：《金山卫志》下志卷三，《上海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本》影明正德十二年刻本。



说主要是嫩食。明以来闽、浙一带俗称黄瓜为刺瓜,应即因食用带刺嫩瓜为主。明中叶苏州周文华《汝南圃史》:“(黄瓜)有青、白二种……五六月结,俱宜嫩摘,老则色黄。”<sup>①</sup>清人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瓜可食时色正绿,至老结实则色黄如金,鼎俎中不复见矣。有刺者曰刺瓜。《齐民要术》无藏胡瓜法,盖不任糟酱。”<sup>②</sup>所说完全转向食嫩而非食老。这也许有一些南北区域差异,但更是一个普遍趋势。《齐民要术》并非无藏法,称黄瓜“酱中藏之”,而吴其濬称不耐糟酱,显然看重的是嫩食,典型反映了中古与明清食老与食嫩两种不同食用习俗的前后变化。

## 二、丝瓜的起源

科学界普遍认为丝瓜也原产于印度或以印度种植历史最为悠久<sup>③</sup>。我国丝瓜的栽培起源是个难解之谜,宋以前各类著述均未见<sup>④</sup>,宋代始有著述涉及,我国丝瓜的起源应就中寻绎。宋代的丝瓜信息主要有这样一些:

首先是医药类著作。出现最早的应是署名东轩居士的《卫济宝书》,宋人称传一卷,今所见乃从《永乐大典》辑编而成。卷首作者自序提到“玉女飞花散”一方传自不老山高先生,当是指宋太祖乾德年间祁门不老山龙兴观道士高景修<sup>⑤</sup>,又提到休宁道士,可见该书乃宋人著作,作者应为徽州祁门、休宁一带人士。又卷首董璚序,其中有乾道六年(1170)纪年,可见作者最迟也应是宋高宗朝人。作者序言中提到该书主要哀辑风毒疮疡类外科古方,而方下注说应是作者自增。全书出现丝瓜共四处,属方中正药仅一处,即“服食仙翁指授散”中用“丝瓜一两”,其他三处以丝瓜汁作副药调饮。其中“正药指授散”方中说丝瓜“生者佳。冬日无,可于霜前收,临时末之以傅。生者则细切,石臼中杵绞汁,以一盏当一两,不用醋调,只用汁调更佳。此物亦有阴阳,长瘦为阳,短肥为阴,可偶用之”<sup>⑥</sup>,可见对丝瓜效用的认识已较为深入。湖南安抚使刘昉(潮州海阳人)任上(绍兴十四年任)所编《幼幼新书》,有绍兴二十年(1150)门人李庚序,是绍兴中叶之作。记载“治热毒疮方”捣丝瓜汁与硫磺、槟榔合敷<sup>⑦</sup>。宝庆二年(1227),魏岷(鄞县人)《魏氏家藏方》治肿疔两方也以丝瓜汁作调敷<sup>⑧</sup>。以上诸家用法都比较一致,多以丝瓜汁作辅药。宋末杨士瀛(福州人)《仁斋直指》除丝瓜汁治疮外,始用丝瓜烧灰为药<sup>⑨</sup>,应属新的发明。另有传许叔微《本事方续集》,今有日本传刻本,该书用药与宋高宗朝许叔微《本事方》多有不合,有学者疑其为后世俗医伪托者,所说颇有道理<sup>⑩</sup>。其中“治肠风”方中有“绵瓜”烧灰以酒调服一方,注称:“绵瓜……一名蛮瓜,一名天罗,又名天丝瓜,其实皆绵瓜也。”又有取缘虫方,用“苦绵瓜子”,研末以酒调服<sup>⑪</sup>。所说绵瓜,是丝瓜无疑,但这些用法显然都远远超出了此间《卫济宝书》《幼幼新书》等丝瓜用法的范围,应远出宋以后。明初朱橚《普济方》已引述许氏这一“治

①周文华:《汝南圃史》卷一二,明万历书带斋刻本。

②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卷四,清道光山西太原府署刻本。

③[英]德空多尔:《农艺植物考源》,第145页,[日]星川清亲:《栽培植物的起源与传播》,第182页。

④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二八丝瓜下附天罗勒,引陈藏器《本草拾遗》所录“天罗勒”,认为“江南呼丝瓜为天罗”,怀疑有可能天罗勒即丝瓜,“然无的据”,未能确定。《本草拾遗》今不存,唯有宋《证类本草》引用。《证类本草》卷一〇辑录《拾遗》:“天罗勒,主溪毒,授碎傅之疮上。天罗勒,生江南平地。”后一“天罗勒”略显重复。检他本文字有异,第二句清光绪间柯逢时《武昌医馆丛书》影刻宋本《经史证类大观本草》作“似罗勒,生江南平地”,日本国会图书馆藏本作“以罗勒,生江南平地”,显然“以”当为“似”字误,也就是说,后一“天”字应作“似”。两句是说天罗勒的性状和生境,称其形似罗勒。罗勒也是一种草本药物,天罗勒或因与罗勒形近而得名,与别名“天罗”的丝瓜并无关系。唐人著述中未见有关丝瓜的记载。

⑤周溶修、汪韵珊纂:《(同治)祁门县志》卷一〇,清同治十二年刊本。

⑥东轩居士:《卫济宝书》卷下,清光绪《当归草堂医学丛书初编》本。

⑦刘昉:《幼幼新书》卷三七,明万历陈履端刻本。

⑧魏岷:《魏氏家藏方》卷九,日本钞本。

⑨杨士瀛:《仁斋直指》卷一六、卷二一,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⑩李具双:《〈本事方续集〉辨疑》,《中医文献杂志》2006年第1期。

⑪许叔微:《类证普济本事方续集》卷九,日本享保书林向井八三郎刻本。

肠风”方<sup>①</sup>，因此该书应出于元人。其中所说丝瓜本名“绵瓜”，宋人未见提及。明清方志物产中偶见记载绵瓜，一般多指甜瓜<sup>②</sup>，个别例外如福建《（同治）宁洋县志》物产志瓜属列南、瓠、西、刺、冬、王、绵、甜、苦、土、金等瓜，这里的“绵瓜”，可能是指丝瓜<sup>③</sup>，但时间已经很晚了。笔者认为，《本事方续集》的“绵瓜”应是“丝瓜”繁体之误刻，而非丝瓜实有此名。

二是类书。温革《分门琐碎录》是一部以农圃、生活日用知识为主的类书，本有20卷，成于绍兴间，又有《续录》20卷，出于南宋中叶，今俱不存<sup>④</sup>。世传明抄本，应是只选抄其中农艺部分，今有《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及化振红校注本。其中“种菜法”有一条：“种丝瓜，社日为上。”<sup>⑤</sup>另开禧元年（1205），孙奕《示儿编》举百物异名，引《琐碎录》：“鱼际曰丝瓜。”<sup>⑥</sup>是说丝瓜别名鱼际，此条化振红校注本失收。宋末陈景沂《全芳备祖》、谢维新《事类备要》都是大型类书，两书花木资料多有相同之处，当是坊间编刻转相抄录所致。《全芳备祖》瓠门辑《草木记》：“丝瓜一名天罗絮，所在有之，又名布瓜，有苦、甜二种。多生篱落，开黄花，结实如瓜状，内结成网。”《事类备要》作：“今一种名丝瓜，一名天罗絮，一名布瓜，绿深色，有纹及斑斑点子，有长二三尺者。”<sup>⑦</sup>两书所辑资料出处注释都极为草率、混乱，《全芳备祖》所辑《草木记》多出《南方草木状》《益州草木记》，但此段文字作者和时代不明，所称《草木记》是实有其篇还是随意编名也未可知，至少《事类备要》这段文字并未称出于《草木记》。尽管《草木记》是否属实值得怀疑，《全芳备祖》《事类备要》所录这两段文字却十分具体，称丝瓜有“苦、甜二种”，有天罗絮、布瓜等别名，后世有关记载多有引用。

三是诗文和笔记。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一记友人涤砚法：“用蜀中贡余纸先去墨，徐以丝瓜磨洗，余渍皆尽，而不损砚。”这是用老瓜筋络洗涤器物最早的记载。同时张镃《漫兴》诗云：“茅舍丝瓜弱蔓堆，漫陂鸭鸭去仍回。”<sup>⑧</sup>宋末陈景沂《全芳备祖》收同时杜汝能（号北山）《咏丝瓜》“数日雨晴秋草长，丝瓜沿上瓦墙生”与赵梅隐《丝瓜》“黄花褪束绿身长，白结丝包困晓霜”<sup>⑨</sup>，宋末元初方凤《寄柳道传黄晋卿两生》诗“依依五丝瓜，引蔓墙篱出”<sup>⑩</sup>，月泉吟社桐江君瑞《春日田园杂兴》“白粉墙头红杏花，竹枪篱下种丝瓜”<sup>⑪</sup>，这些生活在今浙江地区的文人作品都表明，至少在当时的两浙地区，丝瓜的种植已成普遍现象。

四是地方志。宋《（宝祐）琴川志》<sup>⑫</sup>，稍后元中叶《（至顺）镇江志》<sup>⑬</sup>物产志开始记载丝瓜。

从时间上说，这些信息高度集中在南宋，并大致涵盖南宋前、中、后三个阶段，是一个持续发展的信息链。其中最早有三个明确出现在高宗绍兴间，只有《卫济宝书》具体成书时间不明，但一般不会孤悬在北宋前期，而应与《幼幼新书》《分门琐碎录》等相去不远，或即只在两宋之交，最早也只在北宋后期。整个北宋时期本草学的编纂频繁，详赡如北宋末年的《证类本草》包括《大观本草》俱未及丝瓜，可见丝瓜用作药物出现不久，尚未引起关注。南宋初年所载也多属取汁辅饮，作用有限。因此可

①朱橚：《普济方》卷三八，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0年，第957页。

②如明人刘熙祚修、李永茂纂《（崇祯）兴宁县志》（明崇祯十年刻本）卷一与清人宋嗣京修、蓝应裕纂《（康熙）埔阳志》（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卷一物产完全相同，“蔬属”均列“苦瓜、丝瓜、黄瓜、冬瓜四种”，而绵瓜与西瓜一道入“果属”，当是甜瓜品种。

③董钟骥修、陈天枢纂：《（同治）宁洋县志》卷二，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

④关于《分门琐碎录》的作者、时间，请参阅笔者《论宋代水仙花事及其文化奠基意义》，《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

⑤温革：《分门琐碎录》“种菜法”：“种丝瓜，社日为上。”参见化振红：《〈分门琐碎录〉校注》，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第177页。

⑥孙奕：《示儿编》卷一五，元刘氏学礼堂刻本。原书举出处作“《琐碎录》”，显然是《琐碎录》之误。化振红校注本失收。

⑦谢维新：《事类备要》别集卷六〇，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⑧张镃：《南湖集》卷九，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⑨陈景沂：《全芳备祖》后集卷二五，程杰、王三毛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203页。

⑩方凤：《存雅堂遗稿》卷一，民国《续金华丛书》本。

⑪吴渭：《月泉吟社》，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⑫孙应时：《（宝祐）重修琴川志》卷九，清道光影元钞本。

⑬俞希鲁：《（至顺）镇江志》卷四，清嘉庆《宛委别藏》本。

以说,我国丝瓜的出现或最初利用只可上溯到北宋中期或稍前,文献记载以《卫济宝书》最早,属于北宋后期或南渡初期。

从应用价值上说,最早的记载多是药用,继而是用老丝瓜筋作洗涤用物,接着才是食用。《分门琐碎录》所说种丝瓜,就应该是用作蔬菜,而只是到了南宋后期才多见诗歌写及丝瓜,表明种植趋于普遍,又分出苦、甜二种,食用价值得到重视。至此,丝瓜的应用价值已得到较为全面的认识。

从空间上说,这些宋人信息除最初出现的《卫济宝书》《幼幼新书》两种医书外,均出于今浙江、福建两省人士,也就是说宋人种植、食用的信息均出于这两个地区。《分门琐碎录》编者温革是福建惠安人,曾任职洪州(治今江西南昌)通判,南剑州(治今福建南平)、漳州(今属福建)知州,福建转运使等职。续录者陈晔是福建长乐人,曾任淳安(今属浙江)知县、汀州(治今福建长汀)知州、广东提刑、四川总领等职。陆游是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张镒、杜汝能都久居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方凤是浦江(今属浙江)人,君瑞是桐庐(今属浙江)人,他们主要生活在今浙江省。最早记载丝瓜的地方志《(宝祐)重修琴川志》也属浙江。《全芳备祖》编者陈景沂是天台(今属浙江)人,《事类备要》编者谢维新是建安(治今福建建瓯)人。这些作者的籍贯或生活范围高度集中在浙江、福建两省,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或者包含了我国丝瓜起源的一些信息。

接着而来的问题是,丝瓜是否外来,如属外来,又传自何方。以我们这样农耕文明极其发达、植物知识积累十分丰富的国度,宋以前漫长历史时期未见丝瓜的任何迹象,有理由认其为外来植物。《分门琐碎录》所说别称“鱼际”,这是丝瓜最早见载的别名,值得注意。后世有许多不同写法,元危亦林《世医得效方》载外科治疗鱼脐丁疮方用丝瓜叶,注称“即虞刺叶”<sup>①</sup>,明初朱橚《普济方》称“丝瓜,俗云鱼鳃,夏月人家栽作凉棚者是也”<sup>②</sup>。明中叶杨廉作《虞思传》,就丝瓜别名以文为戏,题注称:“丝瓜菜,属吴楚间方言,呼虞丝犹言乱丝,又呼纺线,其得名或以小蔓紫络如丝如线耳。”是说吴楚俗称丝瓜为虞思、虞丝。稍后李时珍《本草纲目》鱼鳃、虞刺两名并载。瓜以鱼命名,六朝《广志》载辽东、庐江、敦煌瓜中有“鱼瓜”之名<sup>③</sup>,应为甜瓜之属,义在象形,与丝瓜无关。不难看出,所谓鱼际、鱼鳃、虞刺、虞思、虞丝是同音异文,应属外来物种拟音或音译的不同写法。

丝瓜另有别名“蛮瓜”,最早应即出于所谓许叔微《本事方续集》“治肠风”方,注称“(绵瓜)一名蛮瓜,一名天罗,又名天丝瓜”<sup>④</sup>。朱橚《普济方》引用此方径称出《本事方》,后世相沿遂有丝瓜别名蛮瓜、天罗诸说。蛮多指我国南方少数民族,今闽、粤、桂、黔、滇诸省当时均被视作蛮貊之地,李时珍因此说“始自南方来,故曰蛮瓜”<sup>⑤</sup>。今人多称丝瓜广泛分布于东南亚、南亚等国,因而称我国丝瓜来自印度或东南亚地区。丝瓜在我国最初有可能出现在上述古蛮貊之地,这里与东南亚、南亚诸国毗邻或隔海相望,气候条件相近,是否同属丝瓜的原产地无从稽考。但这一名称使人们容易想到,我国丝瓜是由这些地区发源,或首先在这些地区传入的。

遗憾的是,宋人有关信息反映的情况并非如此。宋代相关记载最为丰富的是闽、浙两省,而不是粤、桂、黔、滇等岭南边鄙之地。不仅是宋代,即就整个古代而言,也以闽、浙两省信息最为密集。在爱如生《中国方志库》第一集中分省检索“丝瓜”二字,得数排前面的是福建(不包括台湾)144条、浙江142条、广东(不含海南)98条、山东97条、江苏(含上海)90条、安徽75条、江西65条、河南58条、广西53条、贵州48条,福建、浙江两省最多,而以福建居首。两省相邻,很有可能是我国栽培丝瓜的源头所在。其中台湾省也有26条,超过云南22条、四川22条、海南21条,进一步证明古代丝瓜的栽

①危亦林:《世医得效方》卷一九,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朱橚:《普济方》卷三三〇,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欧阳询:《艺文类聚》卷八七。

④许叔微:《类证普济本事方续集》卷九。

⑤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二八。



培中心应在以福建、浙江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地区。两省同在我国东南沿海,南北相邻的江苏、广东,还有山东都是信息数量较多的省份,也都是濒海地区。这些“大数据”都使我们产生丝瓜经海上丝绸之路传来的联想,丝瓜很有可能来自海上,最初由福建、浙江登陆。隋唐以来,浙江、福建社会、经济逐步兴起,海外贸易长足发展,福建泉州与浙江宁波成了重要的海外贸易港口。丝瓜在这一地区骤然兴起应与宋以来这一带海外贸易兴起密切相关。我们不难想象,丝瓜如属外来物种,应是随着宋以来闽、浙一带海外贸易的兴盛而传入的。

闽、浙两省中,只有福建在唐宋时仍可称作南蛮之地。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岭南两广含今海南地区的地方志多这样著录丝瓜:“丝瓜,一名水瓜,即闽中天萝”<sup>①</sup>,或反过来作“水瓜,一名丝瓜,即闽中天萝”<sup>②</sup>,至于广西则称“丝瓜,俗名水瓜,即闽中天萝,传种自广者”<sup>③</sup>。这种叙述方式清晰地表明岭南的丝瓜是传自福建,其大致路径是由福建至广东,再由广东传至今广西、海南。丝瓜之别名蛮瓜,既有可能指其传自南闽,也有可能指其来自海外,是由东南海路传入的。

总结我们的论述,黄瓜的传入应与东汉以来佛教的传入有关,十六国时期的译经中已有“胡瓜”之名,隋炀帝时改名黄瓜。受佛经对其性味负面说法的影响,长期未获重视。南宋以来,种植、食用逐渐普遍起来,且由早期食用老瓜转为以食用嫩瓜为主。我国宋以前无任何丝瓜迹象,北宋后期以来始见记载。其别名“鱼际”或为外来音译,传入我国当在北宋中期或稍前。宋人有关记载多出福建、浙江,此后地方志的记载也以此两省最多,两广方志多称从福建引入。由此可见,丝瓜当是入宋后,随着闽、浙一带对外交通贸易的兴起而由海上传入。

(责任编辑:高峰)

## On the Origins of Cucumber and Loofah in China

CHENG Jie

**Abstract:** The introduction of cucumber into China should be related to China's import of Buddhism since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There had already been *hugua* 胡瓜 (literally foreign gourd) in the translation of sutra in the period of the Sixteen Kingdoms and it was renamed *huanggua* 黄瓜 (literally yellow gourd) during the reign of Sui Yang Emperor. Cucumber had been ignored for a long time because people were influenced by the negative statement on its property in the Buddhist scriptures. Since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planting and eating cucumber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popular and the main edible variety changed from the early old cucumbers to the tender ones. There were no signs of loofah before the Song Dynasty in China and its first record was seen in the late Northern Song Dynasty. Loofah, whose alias *yuji* 鱼际 might be a transliteration of its foreign name,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in the middle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or even before. There were some relevant records about loofah mostly from Fujian and Zhejiang areas in the Song Dynasty. Since then, the most of the records about loofah have also come from the local chronicles of the two provinces. The local chronicles of Guangdong and Guangxi provinces repeatedly mention that loofah was introduced from Fujian. Thus it can be seen that with the rise of foreign transport and trade in Fujian and Zhejiang provinces, loofah was introduced into inland areas by sea in the Song Dynasty.

**Key words:** cucumber; loofah; species; origin; exotic

①戴璟:《(嘉靖)广东通志初稿》卷三一,明嘉靖刻本;唐胄:《(正德)琼台志》卷八,明正德刻本。

②欧阳保:《(万历)雷州府志》卷四,明万历四十二年刻本。

③林希元:《(嘉靖)钦州志》卷二,明嘉靖刻本。